

金开诚
金舒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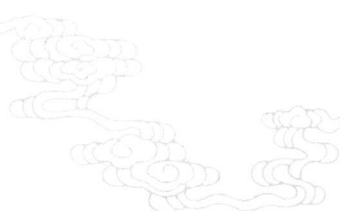
人文随想



中国文史出版社

金开诚 金舒年 著

人文随想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随想/金开诚、金舒年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8

ISBN 7 - 5034 - 1685 - 8

I. 人… II. ①金…②金… III. 社会科学 -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2041 号

责任编辑:段 敏 封面设计:杨飞羊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北京华正印刷厂 邮编:100076

装 订:北京华正印刷厂 邮编:100076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9.875 字数:210 千字

印 数:3000 册

版 次: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前言

我曾一再说过,进入老年以后,写点文章有利于养生保健,延缓脑功能的衰退。这一措施究竟是否有效呢?看来确乎是有一定效果的。例如这本文集中的长短文章均作于2001年至2003年,三年之内写了这么些文章,虽然大都平淡无奇,但总还出自胸臆,思路大致明晰,语句也还连贯。假如这三年什么都不写,现在再要动笔恐怕就很难很难了。

虽然如此,大脑在生理上日趋衰老还是不可抗拒的,这在文章中就可以看出来:一、视野变得狭窄了;二、词汇变得贫乏了;三、写作中很少笔墨酣畅之时,更无一气呵成之作;四、由于对某些问题过于执着,而记忆力又显著衰退,所以有些文章出现了内容重复的现象;五、由于精力不继,视苦心经营为畏途,所以多用对话形式来写,以减少“起承转合”的难处。

为养生保健而写文章,最好多写抒发性灵、优游闲适之作。但一则因为我尚未退休,而所从事的工作又要密切关注社会现实;二则因为积习难改,总想讲些道理而不擅抒情;三则缺乏潇洒的心态和相应的文笔;所以我的诸多拙作仍属于“文以载道”那一类。心里仍盼着某些愚见能供世人参考,起一点现实作用。但我其实也很明白,这些文章概属“不写白不写,写了也白写”一类,只能表表心意而起不了什么作用。

写作既有利于养生而应该写,写了又没用而其实不必写,于是就有人给我提了个建议,说“为了养生你可以大写特写,但既然无用,你就不必寄出去发表了。这就像老太太晨练,练得很来劲,但并不参加比赛”。我觉得此话有理,所以有暇便写一些只给自己看的文章。三年之中,这样的文章共写了三十多篇,其中完稿者只有十篇。这次编文集,把完稿的十篇看来看去,觉得可以入选的只有一篇,即收入本集的《名著笑谈》。收这一篇也只是为了让读者看看那些只给自己看的文章究竟是什么样的。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不准备发表就不肯苦心经营,所以三十多篇中倒有二十多篇并未完稿,有些只写了开头的几段。文章本是“挤”出来的,不“挤”就不易精当也不易完篇。这样,大脑就得不到真正的锻炼;结果还是个“白写”,起不到养生保健的作用。

小女舒年是我的合作者。她毕竟比我年轻,思想易于变通。她认为我对文章“有用”、“没用”的看法过于机械,说“文章要‘立竿见影’起作用,这连孔子、孟子都做不到,所以周游列国到处碰壁。当代人都说钱钟书学问做得好,写了许许多多颂扬的文章,却并无一人再像他那样做学问。现在写随笔、写杂文的人那么多,谁读了真当回事?”她又称赞我对政协委员“建言献策”的看法“相当精辟”,因为我说过这些建议起到了“积累舆论”、“扩大认同”的作用;虽不能“立竿见影”,却有利于“水到渠成”。在她看来,我们的文章多数也可作如是观。她还说“从古至今各种人士写出来的文章浩如太平洋,但绝大多数都归于无用,变为尘土或纸浆;但如果人们不写这么多文章,那么中华传统文化可要单薄多了。咱俩的文章在现实中起不了什么作用,但现实中也还需要诸如此类的文章。这就好比一个书刊大超市,顾客盈门固然是为了热门书刊,但也要有大量冷门书刊在一旁陪着才像个大超市的样子。假如只卖热门书刊,那就像个街头书摊了。只有街头书摊又怎能反映我国当前

文化出版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个比喻听起来倒也不为无理。

笔者生平治学注重“学以致用”，坚持“学为基础，想为主导，落实到用”。而结合我的职业来看，所谓“用”也无非就是写文章。孔子论学，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很赞同这两句话，但又补充了一句，叫“学思而不用则白费心力。”同时又将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改为“知识能用才是力量”，以之自勉。

我如此强调知识的使用及写文章，自然在写的方面用了很大的力气。本书是我生平所著（包括独著和合著）的第三十本书，照理这应该是略可欣慰的。然而，这三十本书的印数加在一起，可能还比不上了一本热门畅销书。现在又从小女的比喻中获悉，我们的书只是在“大超市”中起到了奉陪热门书的作用。这就使得欣慰之感微乎其微了。

但是，我看许多运动员一旦退出运动场，其衰老的速度似乎超过了从来不运动的人。由此而想到，一个曾靠“挤”文章来维护大脑功能的人，突然不想再“挤”了，其大脑功能的衰退速度也势必超过从来不“挤”的人。因此为养生保健计，还必须继续“挤”文章，乃至出书，但出书并不能为出版社带来经济效益，也没有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所以谨在此对出版社的同志深表谢忱和歉意。

（2004.1.16）

目 录

前言

治学与做人	(1)
谈“归纳论证”	(3)
思维模式与文化遗产	(8)
古为今用谈录	(22)
谈谈“不拘一格降人材”	(28)
不拘一格“诗”人材	(34)
职业实践与“不拘一格降人材”	(39)
学历与学问	(43)
漫议职称与学位	(48)
杂谈“博导”	(51)
育才漫议	
——采访谈录	(54)
试说“真才实学”	(57)
杂谈学术兴趣	(62)
根据兴趣选专业	(66)
“写作低龄化”答问	(70)
谈谈“学术大众化”	
——在“学术大众化”座谈会上的发言	(72)
两个误区 三种言语	(76)
对说话的粗浅感想	(82)
略说传媒中的语文错误	(85)
五十年前事,此日当纪念	(88)

目 录

短话二则	(92)
读书与知识的使用	(94)
学术著作出版展望	(98)
小书可起大作用	(103)
满怀喜悦荐新书	(106)
喜读新书开异想	(109)
名著笑谈	(112)
古为今用 别开生面	(119)
帆迷《古文观止》	(123)
在《追梦》杂志创刊会上的发言	(126)
安危与共 风雨同舟	(129)
闲谈偶录	(133)
知难而进	(142)
试说“民无信不立”	(147)
略说中关村的区域文化与精神	(151)
话说“富民”	(158)
抗疫今昔	(160)
漫话校训	(162)
通说“干净”	(165)
人格魅力在“坚净” ——在启功先生从教七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	(168)
小议“火气”	(170)
漫话人名	(171)
饮茶帆迷	(174)

目 录

从一个“历史之谜”说起	(177)
“呜呼,火坑”!	(181)
亦庄亦谐说“四”“八”	(185)
从“羊”与“猴”说起	(190)
学书未成	(194)
中国书法艺术与传统文化(讲录)	(197)
从心理学角度谈谈书法艺术熏陶	(217)
试说中国书法的纯艺术化趋势	(227)
杂谈书法艺术	(233)
谈书法艺术之“拙”	(239)
与刊授学员谈书法欣赏	(243)
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国当代书法	(249)
立足传统 面向未来	
——访谈录	(262)
从古诗的发展想到京剧	(270)
帆旧寄念	(275)
漫谈电视剧	(279)
电视剧与抗衰老	(284)
实行“成功之道”的艺术形象	(287)
闲谈《孝庄秘史》	(293)
字幕何故错误多	(297)
再谈字幕何故错误多	(301)
补说字幕何故错误多	(305)

治学与做人

我在很久以前曾写过一张条幅，写的是“学术关乎心术，人格现于风格”。有人跟我开玩笑，说“我给你看一部物理学著作，你能不能看出作者的心术？”我说“不能。”他又说“我给你看一幅无名氏的画，你能不能评说作者的人格？”我又说“不能。”于是他笑我在条幅上写的是空话。我感到自己对治学与做人的关系的确并未深思，只因传统观念中认为二者有关系，我也使人云亦云了。

近年来，治学与名利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无论是学术界或文化艺术界都出现了不择手段追逐名利的现象。于是，我又觉得有关的传统观念还是有道理的，只是不能过于机械地理解。

经过粗浅的思考，我认为治学与做人发生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乃在于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与奉献。

创造与奉献是人类特有的社会行为。动物没有社会，也没有这种行为。因此，创造与奉献真正关系到人类个体“自身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说，致力创造，乐于奉献，这才无愧于一个“人”字。

但创造与奉献并非只靠智能因素就可以实现，还要有心理上的“非智能因素”（包括意志、毅力、情操、兴趣、情感控制等等）的紧密配合，也还受到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制约与驱动。

如果“非智能因素”质量差，又较少自觉的道德意识，那是不大可能作出较大的创造与奉献的。

就拿学术界现在比较多见的抄袭剽窃和故弄玄虚来说，有些人明明知道是错的，却为什么仍然要这么做？显然因为急于追求名利。这样的人缺乏那种意志、毅力来苦心钻研，又因情操、趣味的庸俗而深受物质刺激的诱惑；因此心情躁切，贪而多欲，在治学上无法专注投入，也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创造与奉献。由于学术界的运行体制中存在薄弱环节乃至各种漏洞，所以有人虽然缺德败行也竟然能够名利双收；于是他便认为这是“实现了自身价值”。殊不知这样得来的名利越多，越说明他缺乏创造的能力和奉献的觉悟，离开人的“自身价值”的真正实现也就越来越远。

先母毕生以中医为业，曾一再对我说过李时珍《本草纲目》多么了不起。我翻阅此书，觉得作者为这部巨著投入的心力实在是惊人的。遥想当年他编书若只以追求名利为动机，那就不可能作这样的投入；因为在编撰过程中他根本看不到成名获利的前景。

从这一点想起，发觉中国古代有许多学术文化巨著都是在强大的创造与奉献精神的驱动下才得以完成的。因为许多作者在其生前都无法指望这些著作会出版问世，更不要说获得报酬了。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学人在治学方面取得了成就，自然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治学到了较深的境界，仍还需要更高的精神动力。所以，越往深处想，便越能意识到治学与做人的关系。

(2002.1)

谈“归纳论证”

归纳论证是各类文章中最为常见的论证方法，其具体表现便是引用实例来证明论点。这种论证方法有其认知上的根据，即在事物的认识过程中，某个论点、某种判断或某种道理的形成，是对大量事实作了归纳和概括的结果。

归纳论证是各类文章作者手中的“利器”，但并不是随意运用便能使文章中的论点、看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虚假的、粗疏的、非科学的“归纳论证”不仅使文章缺乏可信性，而且还常常表明在学风上存在问题。

真正科学的、绝对可信的归纳论证只有一种，就是“完全归纳论证”。这种论证方法必须列举论点外延所包括的全部事实来作论据。但是，无论就认知过程或写作实践来说，“完全归纳论证”事实上往往难以实行。例如说“人类中的智能正常者能够学会并使用语言”，这一论点若要用“完全归纳论证”来加以证明，那就要收集地球上每一个正常人学会和使用语言的情况，这显然是难以做到的事。

由于“完全归纳论证”的使用范围极为有限，所以真正在文章中可以使用的，乃是“科学归纳论证”。这种论证方法不需要列举论点所涉及的全部事实，即使只举少量实例，如果能正确揭示论据与论点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就可以证明论点的可

信。例如智能正常的人之所以能学会并使用语言，乃是因为人类具有相应的生理结构和功能，并生活在人际环境之中。这种生理因素和生活环境是人类进化到现阶段所普遍具有的，也是人人基本相同的。所以，只要以某些正常人为例，揭示出这种生理因素和生活环境与语言学习之间的必然性因果联系，就可以证明“人类中的智能正常者能够学会并使用语言”。

“科学归纳论证”这个名称极为动听，然而使用起来却必须严谨，否则恰恰会给非科学、反科学、伪科学大开方便之门。大致说来，有几种情况需要注意：

一、事例必须真实，切忌杜撰捏造、捕风捉影、移花接木等等做法。“大跃进”中有人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从“亩产多少万斤”的诸多“事例”中“归纳”出来的。若要论证，“例子”随手可得。但这些“例子”实际上是假造出来的，所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也就只是主观唯心的胡说。“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打倒某个人而给他罗织罪状，为了打派仗而攻击对方，往往连篇累牍列举许多“事例”，看起来是极为充分的“归纳论证”，但这些“事例”实际上往往出于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乃至恶意编造。

二、论据必须能确切证明论点。假如似是而非，则说明作者对有关的事实作了错误的归纳，所以论点不能成立。例如，为了证明“形象思维不受逻辑思维的制约与配合”，只是列举大量艺术作品“纯以形象说话”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作品乃是形象思维的最终结果及其“外化”，并不完全表现形象思维的实际进程。所以在作品中看不出逻辑思维的表现，完全不能证明在创作的思维进程中没有逻辑思维的指导、配合与渗透。又如，为了证明屈原创作《天问》用的是“神话思维”，列举篇中提及的大量神话为论据，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论证。因为这些神话传说并非屈原所

创作，而是前代传下来的；屈原在《天问》中引用这些神话传说，恰恰因为对它们很有怀疑，所以提出质问。这种怀疑和质问主要出于理性思考，可见说《天问》的创作用的是“神话思维”，乃是对全篇内容作了错误的归纳。

三、注意区分因果联系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前面讲过，“科学归纳论证”有赖于论据与论点之间必然的因果联系。但因果联系并不都具有必然性，若只是偶然出现的原因与结果，论据就不能证明论点。《韩非子·五蠹》提供了一个著名的寓言“守株待兔”，说宋国有个农人因见兔子在奔跑中触撞树桩而死，便守在树桩旁，等待再有兔子来触撞。兔子撞死与宋人得兔，这确是因果关系；但这因果关系却有极大的偶然性，而宋人竟因此认为兔子撞死这个事例可以证明只要守在树桩旁便能得兔，岂非荒唐？所以这就成了一则生动的讽刺寓言。过去朴学家提出“例不十，法不立”，便是为了防止用偶然出现的“孤证”来得出结论，这是一种较为谨严的态度。“孤证”是不能用于“归纳论证”作为证据的，因为就其认知过程而言，就像“守株待兔”的宋人那样，根本未作任何“归纳”。但“孤证”却可能被做成“归纳论证”的假象，即先摆出一个臆想出来的论点，再以“孤证”作为实例来加以“证明”；有的还加以“包装”，说几句“其例甚多，不胜枚举”或“这里仅举一例”之类的话。其实，他所掌握的仅此一例而已。这样的“论证”当然是很虚假的。

四、注意区分因果联系的直接性和间接性。归纳论证中的因果联系必须是直接的，即原因直接导致结果，二者不能是间接关系。比如坏人犯罪作恶导致严重的后果，这便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有人说笑话，说坏人作恶是由于其父母使之来到世间，这才是“更为深远的原因”。这种推论若能成立，那么无论什么事情的发生，其原因都可以一直推到不知多少代以前。所以这只是

用诡辩来说笑话而已。事实上，因果联系每经一次中介便增加了多种可能性。因此，原因越有间接性，其与最终结果的关系便越来越不确定。《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个看法概括了极为丰富的人生经验，也可以用许多实例来加以论证。但无论作怎样的论证，都只能证明祸福转化的可能性，而不能证明其必然性。因为祸福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只有间接的因果关系。“祸兮福之所倚”，乃是因为人在遭“祸”之后进行了艰苦的奋斗，奋斗才是得“福”的直接原因，而遭“祸”只是得“福”的间接原因。反之，“福兮祸之所伏”，乃是因为人在“福”中可能骄奢妄为，这才直接导致遭“祸”。总之，祸福的转化主要取决于人的所作所为，而不能认为祸福天然具有相互转化的关系。《老子》原文用“倚”、“伏”二字，是相当准确的，说明“所倚”、“所伏”的东西，还须通过人的行为才会发作出来。

五、归纳论证用于概括全面的结论要特别慎重。这个问题不妨通过一个较为流行的看法来说明：有人认为独生子女有自私、任性、脆弱的特性，这当然可以用许多实例来证明，而且这样的归纳论证是可以成立的。因为独生子女往往受到父母、祖父母的溺爱与过多保护，缺少挫折磨炼和必要的反思，因此容易形成自私、任性、脆弱的个性。这个因果联系使上述归纳论证带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影响绝不是单一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个性形成可能有多种原因，受到不同的驱动。因此，即使举出许许多多实例，也只能证明部分独生子女有自私、任性、脆弱的特性，或者说独生子女较有可能形成这样的个性；而绝不能作出全面概括的结论。在以往所见的归纳论证中，简单地用一些实例来“论证”某个带有整体性的结论，是较为常见的弊病。归纳论证因为是以“归纳”为认知基础的，所以往往被人误以为可以概括全面；实际上由于事物存在和运动的复

杂性，提出概括全面的论点是必须特别慎重的。

以上所说是事物外延（整体与局部）的全面概括。另外，对事物内涵的全面概括也要特别慎重。因为有些事物具有很复杂的属性，用归纳论证来证明某种属性的存在并不等于揭示了主要的内涵。例如有些学者对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并以此来与西方文化作比较很有兴趣，也的确作了不少思索和研究。但某个学者说中国传统文化有这样几个特点，每一特点均在古书中找出相应的言语来作证明；而另一个学者却说中国传统文化有那样几个特点，也都在古书中找到了论据。那么究竟哪个学者的归纳是正确的呢？这就很难判定。由于中国的古书浩如烟海，内容极其丰富，因此很多文化思想都能在其中找到证明；但并不能说明这些思想便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我认为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为某种庞大的“化合物”，是各种思想“元素”“化合”而成；因此不能因为证实了某些“元素”的存在便认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同样，西方文化也是多种“元素”的“化合物”。因此，中西文化的比较应该是“化合物”与“化合物”相比，而不能停留在“元素”与“元素”的比较上。由此可见，两种文化的比较是相当艰深的课题，需要对双方各作深入的综合研究，才能对其内涵作出较为准确的概括。

归纳论证在各类文章乃至人们日常说话中都比较常见，似乎只要举例为证便显得言之有据。实际上举例为证却是很有讲究的。当前学术领域和其他某些领域中的不良风气，往往在归纳论证的使用上有较为突出的表现。所以人们不能见到“举例为证”便以为言之成理；而是有必要作些追究与思索，以判明论证的质量。

(2001.1)

思维模式与文化传承

—

甲：文化可以表现在物质制品之中，也可以表现在思想观念之中。“观念形态的文化”（也就是你过去所说的“狭义的文化”），之所以能在社会发展中长久传承，是与语言载体的概括性、抽象性、稳定性分不开的。例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两句话，虽然是出于《伪古文尚书》，但毕竟来源很古。无论它最早出于什么时代，也无论它流传到什么时代，它总是正确的，无可置疑的。其实，“民”这个语言符号的“所指”变化很大：在奴隶社会，“民”指奴隶；在封建社会，“民”指农民以及未曾进入官僚机构的地主、商人、士人、手工业工人及其业主等等；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指官僚机构以外的所有人。“民”代表的人物变化很大，但“民”这个概念却因其概括性、抽象性和语言的稳定性而始终不变；而以它为主构成的两个判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也就始终被变化了的社会所传承。

乙：我同意语言的概括性、抽象性、稳定性在“观念形态文化”的传承中起了作用。不过，更重要的是对事物之间关系的判断必须正确。判断正确了才能构成思维的模式，可以长久传承。具体说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个模式，其所以具有恒久的可模拟性与可复制性，主要就因为它所包含的两个判断是无可置疑的。“民”不论其实际身份在历史上有何变化，总是指被统治